

张永刚◎著·····

东林党议

与晚明文学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东林党议 与晚明文学活动

张永刚◎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 / 张永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004-8131-7

I. 东… II. 张… III. ①东林党—史料 ②文学运动—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K248.305 ②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8264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郭沂涟
责任校对 王玉兰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齐洲

明代党争尤其是晚明党争历来是明史专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清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专题记述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癸巳京察至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亡国期间的“东林党议”，举凡京察、矿税、保国本、争三案、与三党争意气、与魏阉夺权柄，声势煊赫于天下，影响波及整个社会。论者每将明亡归因于门户之祸，东林党则首当其冲。如明末张岱《与李砚翁》书云：“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筮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为始终。”近人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也说：“门户之祸，起自万历。人主心厌言官，一切不理；言官知讥政府必不掇祸，而可耸外间之听，以示威于政府，政府亦无制裁言官之术，则视其声势最盛者而依倚之。于是言官各立门户以相角，门户中取得胜势，而政权即随之，此朋党所由炽也。”也有学者从另一角度看待晚明党争，如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自序中说：“我觉得明亡于党争，可是吾国吾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其间

又可以看到明季社会的状况和士大夫的风气，是在研究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写这篇文字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醒民族之精神。”看来人们对晚明党争的认识，的确各有不同。而由此开展的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也就异彩纷呈。

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的关系也是文学史家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受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二元分析方法的影响，文学史家的注意力一般均集中在“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临川派”、“吴江派”、“苏州派”等文学流派及其作家作品的评论上，较少从党争所形成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时代风气方面来整体把握晚明文学的主要特点和基本走势，未能深入探讨党争与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2003年9月，友生张子永刚负笈南下，在武昌桂子山从我读博。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们商量以“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为研究方向，希望能够有所突破。这一方面是由于永刚读硕期间以晚明文学为重点，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还发表了《王世贞卒年考》、《贾三近年谱简编》等论文；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的关系密切，晚明文学社团、文学活动、文学流派、文学风格，无不打上了党争的烙印。前贤对此虽已作过一些探讨，但多集中在文学的内容和风格与东林党议的关系上，且多为个案的研究，缺少整体观照。如果能够重点关注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社团、文学流派关系的探讨，尤其注重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的互动关系的梳理，或许能够深入了解晚明时期因党争所带来的文学活动的新特点、新变化，获得对晚明文学面貌和文学发展的新认识。

永刚敦厚质朴，执著勤勉，喜读书，甘于寂寞，有东鲁人的禀性。三年下来，他通读了晚明留存的相关文献和前贤发表

的大量论著，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写成30万字的博士论文，并在《文学遗产》、《江淮论坛》、《兰州学刊》、《船山学刊》等刊物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使我有后生可畏之叹。尤其是在学风飘浮的当下，肯坐下来扎扎实实读书的人已经不多了，永刚能够安心读书做学问是颇为难得的，我常常用他作为例证来勉励其他学生。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刻苦努力得到了回报，其博士论文获得了外审专家和答辩专家的一致好评。这不仅是因为他对东林书院的文学活动和东林党人的社团活动有细致的梳理，让我们能够对党团文社和文学发展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对晚明文学出现的新特点和新面貌有更准确的把握，而且他所提出的一些独特看法，也能够启发我们对晚明文学作进一步思考。例如，他以天启四年（1624）为界，将晚明文学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前期是以狂禅派学术所孵化的性灵派为主导的时期，后期则是以实学思潮所孕育的社团文学为主导的时期，前者以楚地为据点，后者以江南为中心，两大文学思潮交相递嬗、演进发展，而所有这一切，又与党争密切相关。这一认识是否能够为学界所接受，还需要大家讨论，但他能够独立思考的勇气是可嘉的。

读博期间，永刚就和广西民族大学签订了工作合同，他不愿为找工作耗费太多精力，也体现了他务实的性格。毕业后，永刚到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工作，仍然保持着质朴勤勉的作风，深得同事和领导的信任。半年后就被评聘为副教授，一年后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他的关于“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的系列文章也不时见诸于刊物。我为他的成长感到高兴。近期，他又申请了学校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打算将其博士论文公开出版，索序于我，我自然不能推托也不应推托，愿意将他的成果推荐给大家。不过，当我看到他寄来打算出版的书稿

时，又觉得有几分遗憾。因为学校资助出版经费有限，永刚不得不删除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内容。例如，博士论文中原有的阉党的文学活动部分就在这部书稿中被删除了。然而，阉党作为东林党的对立面是不能绕过的，尽管在谈到东林书院和东林党人的文学活动时也涉及到阉党，但那仅是作为党争的背景而展开的，并不是对阉党的正面论述，况且阉党的文学活动也有自己的特点，并构成了晚明文学的重要部分，如阮大铖与中江社及其演剧活动，就必须加以关注。再如，附录部分原博士论文有《东林党政治活动辑录》，我曾建议他增加《东林党文学活动概览》，这样，附录的内容就完整了，因为本论题就是东林党议和晚明文学活动。有这两份“活动”资料，读者读完全文后再系统地集中回顾一下，也许印象会更深刻些。这两份“活动”资料，可以是粗线条的，但应是与党争和文学活动相关联的。永刚对我说，阉党的文学活动部分原博士论文做得不够扎实，先放下也好，等以后深入研究了再做补充。两份“活动”资料，也还未考虑成熟，就都留待以后吧。永刚的意思我明白，现在学术著作出版难，有了资助出版的机会，不妨先将主要部分公诸于世，听听学界的意见，自己再作进一步思考，进一步研究，等到条件成熟，再来补充修订。我是赞成学术研究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的，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永刚对这一课题的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深刻的著作问世，以弥补今天的遗憾。是为序。

戊子年初冬于武昌紫菀·枫林上城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东林书院与东林党的关联	11
第一节 东林书院与东林党的构成	12
一 “天下东林讲学书院”	12
二 东林书院与东林党的关联	21
第二节 东林书院与东林党的旨向	26
一 东林学术与王学的斗法	26
二 东林党的实学思想及政治理念	34
第二章 东林书院与东林党的文学活动	42
第一节 东林书院的文学活动	43
一 东林书院的讲经活动	43
二 东林书院的文社活动	50
第二节 东林党的文学活动	59
一 刘宗周及证人社	59
二 钱谦益及虞山诗派	66

第三章 东林党的地域分布及文学创作	75
第一节 东林党的地域分布及文学创作	76
一 南直双璧:顾宪成、高攀龙	76
二 北直二杰:赵南星、孙承宗	83
三 山左三彦:冯琦、公鼐、王象春	91
第二节 东林党“六君子”、“七君子”的节义诗	100
一 “六君子”的节义诗	101
二 “七君子”的节义诗	107
第四章 东林党议与复、几社的文学活动	115
第一节 复、几社与东林党的关联	115
一 复社与东林党的政治关联	115
二 复社与东林党的学术关联	122
三 几社的政治性转变	125
第二节 复、几社的文学活动	130
一 复社的源流	130
二 复社的社集	135
三 几社与《经世文编》的编纂	139
第五章 东林党议与性灵派的文学活动	143
第一节 公安派的文学活动	144
一 东林学术与“狂禅”的分野	144
二 “狂禅”运动与公安派的兴衰	151
第二节 竟陵派的文学活动	165
一 钟、谭与东林党议	165
二 “钟谭体”的形成	176

第六章 钱谦益对晚明文学的总结	190
第一节 钱谦益与东林党的关联	190
一 政治关联	190
二 学术关联	205
三 文学取向	211
第二节 钱谦益对性灵派的评价	222
一 对公安派的评价	222
二 对竟陵派的评价	234
第三节 钱谦益对复古派的评价	248
一 论唐宋之争	248
二 论陈、艾之争	256
三 “弇州晚年定论”说	260
 结语:东林党议视野下晚明文学的历史分期	267
附录	273
一 明天启年间阉党编造诬陷东林党的 相关名单	273
二 阉党相关名单	306
 主要参考文献	309
后记	318
作者已发表相关论文目录辑览	320

绪 论

嘉靖（1522—1566）以后，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中国文学开始了近古期的转折，“从明中叶到清代的鸦片战争，是中国文学近古期的第一段”^①。仅以嘉靖（1522）至万历（1573）五十余年观之，文学界有前后七子相继立坛建坵，一扫明初文坛雍容、委靡之文风，遂使天下风动，文人士子翕然宗之。在经历了复古文风的洗礼之后，万历以后文学之急变势头更加高涨，公安、竟陵主性灵，以矫复古；复社以文社联盟，重树复古大旗，针砭公安、竟陵，尊经复古，形成高于原点的悖反式演进格局。在思想界，王学之崛起大有与程朱比肩之势。张居正改革尽管极力压制王学，却依然未能阻止阳明在万历十二年（1584）从祀孔庙，加冕“先儒王子”的称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之后的意识形态，已经由独尊程朱一变而为“王与朱共天下”之局面了。思想界的这种变化使得统治阶级所赖以维系的信仰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自由兼启蒙之思潮

^① 袁行需等：《中国文学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汹汹而来。文学界与思想界的变化，脱不了政治的干系。贯穿晚明始终的东林党议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主旋律，掀起了社会各个领域迅急而激烈的变化。

关于晚明党争，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①以“东林党议”呼之，专章记述以万历二十一年（1593）癸巳京察为端，至崇祯十七年（1644）亡国为限，约五十年的政治风云、腥风血雨。动荡的晚明政坛所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有东林党人的参与，保国本、争三案、矿税更兼京察、与三党争意气、与魏阉夺权柄，声势煊赫于天下。东林党以书院为基础发而为朋党，在历代党争中皆未尝见，可谓独树一帜，因其具有共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理想，故能形成更强大的力量，并且有鲜明的救世理论和启蒙思想，易掀起广泛的社会思潮，进而形成体系整合的东林学术，以之干政，从而影响全国的政治格局，波及整个晚明社会。议者每将明亡之果归于门户之祸，而东林党首当其冲。孟森在论其原因时指出：“门户之祸，起自万历。人主心厌言官，一切不理；言官知讥政府必不掇祸，而可耸外间之听，以示威于政府，政府亦无制裁言官之术，则视其声势最盛者而依倚之。于是言官各立门户以相角，门户中取得胜势，而政权即随之，此朋党所由炽也。”^②君主荒于朝政，言官与阁部势同水火，交相争斗，间杂君子小人的意气之争，“而国不可问矣”^③。“自是朋党论益炽，中行、用贤、植、东之创于前，元标、南星、宪成、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日与枝柱，水火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9页。

②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6页。

③ 蒋平阶：《东林始末》附录，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喷射，迄于明亡。”^① 张岱更是将矛头鲜明地指向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筮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为始终。”^② 作为东林后裔的黄宗羲对此语出无奈和悲壮：“今天下之言东林者，以其党祸与国运终始，小人既资为口实，以为亡国由于东林，称之为两党，即有知之者，亦言东林非不为君子，然不无过激，且依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终是东汉党锢中人物。”又云：“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滌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③ 作为气节昭著，励志高远的有识之士，其所做的种种努力是难能可贵的，但溺于君子小人的意气之争，所采取的策略和方式是有失明智的，因而对明亡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悲剧的壮美更甚于历代之党争。

关于东林党议的研究，历史方面居多。王赓唐、赵承中先生曾对1949年10月至1990年12月间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撰写了《建国以来明末东林党研究述评》一文，署名“黄兆”，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上。其后又撰《晚明东林党研究综述》（1991—2004），辑入《东林书院重修4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该书由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收录相关研究论文32篇。这

① 张廷玉：《赵用贤传》，《明史》卷一百一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② 张岱：《与李砚翁》，《柳塘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③ 黄宗羲：《东林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75页。

次学术会议的召开值东林书院400年重修之际，盛况空前，其所交流之研究成果亦应集中体现了学界当前对于东林党这一课题的关注度、广度及深度。而十年前的1994年亦召开了东林党学术研讨会，并于1998年10月由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了《东林党学术研讨会薛福成学术研讨会资料集》。两次会议的成果相比较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变化：

1. 对于东林党的研究视野更加广泛

由主要关注于史料的梳理转向更多视角的研究，涉及思想、学术、政治、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交叉研究。如李承贵先生的《高攀龙的佛教观——兼及高攀龙思想的儒学本色》、步近智先生的《略论泰州学派与东林学派之异同》、张宪博先生的《从依附到参与的政治文化嬗变》、金奋飞先生的《读书静坐会友——明末东林书院日常生活暨讲学教育活动述略》，分别从学术、宗教、政治、教育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和领域。

2. 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对于东林党的评价，由局限于阶级性的探讨，更多转向思想层面的研究，对实学思想的研究有所深入。如金其桢先生《略论东林学派的实学思想体系》认为东林学派由广大“志在世道”、致力于治国救世的在朝在野的东林党人及民间士绅学者组成，其领袖人物是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他们在与“王学”末流和专权阉党的斗争中，继承发扬了我国传统儒学经世致用思想和北宋以来实学思想的精华，并根据时代的实际需要加以发扬光大，先后在教育、学术、道德修养和认识论及治国济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见解，形成了一个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致力治国济民、

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体系，把实学思潮推向了高潮，对当时社会 and 后世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3. 研究的影响度扩大

在 2004 年的论文集中，收录了日本学者鹤久成章先生的《论东林学派“性学思想”之成立》，该文在研究东林学派的讲学精神时，介入了“性”与“学”的关系探讨，认为东林学派所追求的学问，称之为“性学”是相称的。这是认识到朱子学及阳明学局限性的东林学者们，不拘泥于朱、王之学，忠于自己的心性，认真地去探求摸索真学问的结果，而绝非折中朱子学与阳明学之意识下的产物。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为国内学界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借鉴。

总体而言，对于东林党议的历史研究呈现了继续深入，不断创新的良好局面。关于这方面的专著也时有问世。早在 1934 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谢国桢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鲁迅先生当时的评价是“钩索文籍，用力甚勤”。他在自序中说：“我觉得明亡于党争，可是吾国吾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其间又可以看到明季社会的状况和士大夫的风气，是在研究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写这篇文字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醒民族之精神。”^① 谢国桢先生这段话，道出了党争对于晚明局势至关重要的影响，兼及社的问题，为后之学者多所借鉴。其后又有李榕先生的《东林党籍考》（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以《东林党人榜》309 人为目，参以《夥坏封疆录》、《东林点将录》、《东林籍贯》、《东林朋党录》、《盗柄东林

①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自序》，上海书店 2004 年版。

夥》、《东林胁从》、《天鉴录》等诸多东林党名单及相关史料，考证颇详。北京大学王天有教授的博士论文《晚明东林党议》于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10万余字，集中探讨了东林党议的性质、东林党议与张居正改革、东林党议的是非、东林党议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问题，可视为研究晚明东林党议的系统专论。李向英先生的《明末东林党》（中华书局1983年版）、朱文杰先生的《东林党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等对东林党的发生与发展，也做了一定的史料方面的梳理工作。

关于东林党议的历史研究已渐趋热点化，然以之涉及文学研究尚需期待学者们的关注。吴承学先生在《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中指出：“晚明时期文人社团最为活跃，……当时的文人社团，像复社、应社、几社、豫章社都是文学创作兼政治活动于一身的团体，社团文学是值得更为深入研究的问题。”又说：“在史学界有关东林党争的研究较多，但文学界对东林党争与明代中后期文人集团，乃至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还缺乏足够的研究。”^①王齐洲师有《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古典文学知识》1992年第6期）一文，介绍了明代党争的基本情况，并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明代党争对明代文学的主要影响：一、党争刺激了文学社团的勃兴；二、党争对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以至创作风格产生了直接影响；三、明代文学中的不少优秀之作是对明代党争的直接反映。该文之于党争对明代文学影响的宏观把握，为其后进行

^① 吴承学：《世纪之交的对话：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关于党争对晚明文学的影响，目前主要涉及以下几点：

1. 关于东林党议对竟陵派的影响

学界于竟陵派谈及较多。邬国平先生的《钟惺、谭元春与晚明党争的关系》具体针对党争对竟陵派的影响做了重点论述。将晚明党争（南明以前）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从张居正去世到魏忠贤揽权前止，此为党争的剧烈期；二、从魏忠贤揽权至失败，此为党争的激变期；三、从魏忠贤败亡至崇祯朝结束，此为党争的继续期。他认为在第二阶段的党争，“完全表现为东林党同‘阉党’的流血斗争。……有的原来在两派的争论中持观望、中立和超脱态度的人，却从血腥的事实中惊醒过来，反而改变了早先的态度，转而同情和支持东林党（谭元春即为其中的一位）”。第三阶段党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复社的出现，它把当时的知识分子广泛地结集在自己的周围，同阉臣派展开了斗争，从而成为东林党的后劲”。文中提到钟惺在党争中的立场和所持的观点是与东林党相敌对的，属于拥护“庙堂”的内阁派一员。但是在党争中他却遭到了两派的打击。第一次打击是他所拥护的党派，此事发生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第二次打击是天启三年（1623）的癸亥京察。东林党为报复丁巳大计，尽逐齐、楚、浙、宣、昆党诸人。钟惺在中计之列。谭元春早先超脱两派之外而后成为东林党的支持者，并加入复社。党争对他们的影响首先是“推动了他们对现实的关心”，其次是“形成了他们幽深孤峭的文学风格”。^① 陈书录先生指出竟陵派从政

^① 邬国平：《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7页。